

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

——社会学家与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与谈人：

周晓虹：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

翟学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徐永祥：华东理工大学“汇贤讲席教授”

文 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冯 钢：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仇立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周 怡：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张乐天：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当前中国国力强大，民众普遍富裕，教育水平和平均寿命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原创力缺乏，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和人口问题，政府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老化，以及 1980 年代以来始终影响着国人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价值危机”，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挑战。面对这一大变革时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作为改革开放的支持者、参与者和观察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政府提供了各种极其宝贵的支持、建议和批评，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长三角社会学论坛”成立，九位社会学家以“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为主题各自探讨了治学之道，展示了社会学视角的魅力和中国社会学的实力。

不过，我想强调的不是中国社会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因为这马上就要成为过去式，而是我对未来社会学发展的一些期待。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进一步加强对话和学术批评。比如，翟学伟教授的文章强调了面子在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仇立平教授介绍了上海人做事讲规矩、有章程的这一特征，也就是说相比于其他群体，上海人会更不讲面子。我因此想，如果翟教授和仇教授能展开持续对话，他们之间一定会碰出大量的火花。我们也许会发觉面子在中国各地，以及各个行业和群体中的重要性其实是个变量。我们也许还会发觉应该给面子一个 n 维度的定义——其中有些维度在改革开放中被削弱了，而有些维度则得到了延续甚至加强。探索这些多样性，我们不仅会找出造成差异的原因，同时也可以深入了解和分析使得面子文化得以延续的制度性基础是什么。我期待中国社会学家在以后的研究中能进一步加强比较。周怡教授对华西村的研究做得非常出色。但是，华西村的不少做法其实并不特殊，并且任何成功都会产生因为成功而带来新的问题。比如，“保持两头一致”也是从南宋到明朝繁荣延续了十几代的著名浙江郑家村的传统。但正是这一传统使得郑家村与元朝统治者关系太过紧密，从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敌视而走向衰弱。还比如，华西村仅仅是国内“名村”中的一员，其他名村的发展与华西村的发展有什么异同？他们各自所面对的问题又有什么异同？我期待周怡教授日后能领导一个比较“名村”的研究，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总之，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回应周晓虹教授文章中的一个精辟的论断——“事实上，东方和西方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的不同，（而东西方的差异）可能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触摸到的人类不同的发展侧面而已。”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加强在认识论层面上的研究。具体说就是，我们在做社会学分析的时候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叙事和具体案例之间的紧张，以及自己的叙事和自己的个性与价值观之间的紧张。我们每一个社会学家必须反复思考如下的问题：我怎么能保证我的叙事和分析在经验、理论以及社会层面上的可靠性？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尚处空白，西方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其实也比较薄弱，我们完全可以迎头赶上。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自觉地在哲学的基础上寻找独特的本体性资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视角和叙事特色。当然，我期待我们建立的是各种能打通本体、认识、社会机制和经验研究方法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是只流于哲学层面的讨论、无法在经验上落地的社会理论。最后我期待在改革开放的 60 年之际，或者说 20 年以后，社会学能成为中国更大的显学，并且新一代的社会学家能给社会交出一张更好的答卷。

——特约主持人 “长三角社会学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赵鼎新



中国体验：大变迁时代的精神感悟

□周晓虹，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长三角社会学论坛”轮值主席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变迁，迄今已经整整 40 年。在这 40 年中，伴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转移，不仅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创造了令人瞩目的 GDP 增长奇迹，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而且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同样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中产阶级的成长成为令人瞩目的世界级事件。对于同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中国社会学及其研究者来说，其所关注的社会转型的意义之大和影响之深，不仅表现在它浓缩了人类社会变迁的诸多历史进程，带有孙立平所说的文明转折的意蕴；而且在于生活在转型时期的这一代或数代中国人，在自己短短的生命周期中几乎以一种精神“填鸭”的方式，经历了和浓缩了原本需要几个世纪的嬗变，这对 13 亿人的精神或心理重塑称得上是旷古未有。这一切决定了以“中国体验”为学术观照，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中国社会心理学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

就像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如英国人吉登斯所言，本身就是现代性的结果，是 17 世纪始那场席卷整个欧美社会的大变迁的产儿，中国社会近 40 年来朝向现代的急速变迁一样促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进步。中国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近来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将改革开放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转化为学术，这不但可以避免黄万盛所说的“学术损失”，而且可以避免中国的变迁沦为单纯的 GDP 的增长与财富的堆积。为此，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一直到最近几年学术界愈加频繁使用的“中国经验”，都力图从这 40 年的巨大变迁中总结出与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道路相关的价值与意义，并由此呈现出与西方世界尤其是流行的“现代化图式”不同的一整套发展模式。尽管这一模式的独特性受

到了来自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质疑与批评，但也因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获得了广泛的使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改革开放 30 年的时候，我们顺势提出，在将中国社会的变革转化为学术资源的途径上，无论存在怎样的问题，中国经验的提出及其相应的研究，确实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也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总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观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 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方面的变化。我们提出，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也就是说，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讨论“中国体验”，首先涉及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的争辩，即究竟承认还是不承认诸如阶级、民族、国民这样的人群共同体存在某种集体的或共同的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唯名论者认为，只有个体是现实的，而社会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物，是标识这个虚幻存在物的一个名称，因此群体心理不过是人们通过想象建构起来的一种“群体谬误”；而唯实论者则认为社会固然是由个体组成的，但一旦个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就有了独立存在的特性，或者说成了一个实体的存在，具备了组成它的单个个人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正因此，社会唯实论者认为，除个体意识之外，还存在着表征群体心理性质的某种东西，并且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东西来决定的。为了探索群体心理，黑格尔使用过“民族精神”，涂尔干使用过“集体表象”，韦伯使用过“资本主义精神”，托克维尔使用过“群体习俗”……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样论述过那种“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回顾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发现起码有这样两项研究揭示了群体心理因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生嬗变的现实性。第一项研究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

斯·韦伯 20 世纪初写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显然，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一种在基督教新教改革之后在欧美世界普遍出现的社会心态，它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或者说为欧美社会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具体说来，在新教改革之后，引发了传统主义的坍塌，在人们宗教信仰改变的同时，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也发生了朝向现代的改变，其中包括：（1）职业观念的改变，即从原先的天意观转变为天职（Calling）观，这使世俗行为具备了宗教意义，拼命挣钱也有了某种神圣性。（2）金钱观念的改变，即勤奋挣钱的个人同时又必须具备禁欲的能力，将节省下来的金钱作为新的资本进行投资，只有意识到金钱的孳生性，才真正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金钱观念。（3）时间观念的改变，既然我们的世俗生活能够增添上帝的光耀，那么每一刻就都没有懈怠的理由，这种时间观不仅促进了时间度量的精确化（包括机械钟表的发明），而且后来也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纬度。

第二项研究是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英格尔斯和戴维·史密斯 1970 年代共同完成的《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这项始于 1962—1964 年的研究，其对象是阿根廷、智利、印度、以色列、尼日尼亚和孟加拉 6 个国家的 6000 名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在城镇从事比较传统职业的人。两位社会学家想通过这项大规模的经验研究说明，人并不是生来就具有现代性的，促成人们向现代性成功转向的是他们后天的特殊经历。为此，他们围绕工厂制度、大众传播媒介、城市生活和现代教育对人的现代性生成的影响进行研究。用两位社会学家的话说，“我们首先强调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城市生活以及同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触会产生可以同工厂相提并论的影响。在强调这种经历形式更代表现代世界的特征的同时，我们没有忽视教育，更早的研究表明教育是个人现代性的一个有力的预报器”。

作为社会唯实论者，我们同上述学者一样，承认包括阶级、民族和国民心理在内的群体心理的存在及其嬗变的现实性，由此承认“中国体验”是 40 年来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必然反映。我们将

中国体验视为一种生发于特殊历史时代的“国民性”，它反映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整体上具有的社会心态、精神感受与情绪氛围，是一种与时代走向密切相联的时代精神。当然，同英格尔斯等社会心理学家一样，我们一方面承认中国体验是中国国民的一种整体社会心理，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由于阶级阶层地位不同、生活的城乡环境不同、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同、从事的职业类型不同，中国体验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精神状态，它本身也是多元复杂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们讨论中国体验所具有的积极进取的主导层面的时候，也没有忽视中国体验同样具有消极甚至忧伤的纬度。比如，毋庸讳言，由巨大的贫富差异带来的心理刺激或精神感受也是一种中国体验。

三

讨论“中国体验”，其次涉及中国人的精神嬗变所具有的鲜明特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论证，正是中国社会目前所经历的这场转型，同先前的时代相比、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转型的速度快、转型的动力强劲、转型的持续时间长、涉及的人口规模大、原有的历史传统深厚、现有的体制具有刚性特点，甚至包括国家及政府权力的制约度低等特点，决定了中国人民在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的感受和转变具备了鲜明的独特性，其基本标志是社会心理或精神世界的二元性更为突出，或者说它的两极化特征更为鲜明。并且，我们欲图证实，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社会心态嬗变的两重性或边际性，本身就是转型的一种精神景观。

在中国体验的本质特征的讨论中，我们采取了源自齐美尔的“陌生人”、后经帕克改造而来的“边际人”一词，这是置身于“传统—现代”连续统上的人格特征。具体说来，“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

一是传统与现代的颀颀，这种精神上的传统与现代的重叠或颀颀，既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使得生活于其间的个人或社会群体“无所适从”或“朝秦暮楚”，以至于如金耀基教授所言，“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每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

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风”。

二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一方面，理想之所以还会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是因为中国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40年来的进步，让人们感受到了希望；但是，现实又常常令人不满。

三是城市与乡村的对峙，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都市人格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精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乡村人格则是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吻合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敦厚、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同质性、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

四是积极与消极的共存，变迁的迅急，既可能造成中国人积极能动的社会心态，也会孕育焦虑、浮躁、物欲、炫富甚至暴戾的社会心态。记得费孝通先生生前曾以传统中国社会为蓝本，设想在今日中国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安其所，遂其生”的美好社会，但现在看来，只要我们的社会未能从转型中相对固定下来，我们的“中国体验”不能去除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换句话说，中国人不能从精神上解决“漂”的问题——这一理想的实现就依然待以时日。

四

讨论“中国体验”，最后涉及这一研究的独特意义和普适价值。所谓中国体验的独特意义，指的是在这场规模浩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是否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人民曾经经历过的精神嬗变的内在特点与特定逻辑？如果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不过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经历过的心理嬗变的一种重演或复现，那么这种嬗变就没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体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伪命题。而所谓中国体验的普适价值，则是指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是否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与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如果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只是一种个案，那么这种嬗变就没有自己的普适价值，中国体验自然也就成

了一种无法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的“例外”或特殊的“他者”，要想建立林南设想的“有可能超越社会界限去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图式就成了一种费尽心机的枉然。

检视中国社会这40年来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我们意识到其独特性是无可疑的。诚然，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俄国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的同时，也在经历时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中国一个。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而在这种奇特的变迁背景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或者说他们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震荡和嬗变，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自然也会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当然，中国体验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及其精神世界只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他者”，中国体验一样具有普遍性的一面，或者说具有某种普适价值。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表述这种普适价值：

其一，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精神世界的嬗变，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

其二，鉴于在人类及人类文化中存在某些普遍性的因素，就像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在西方形成的理论图式解释中国或东方的经验现象一样，在中国或东方形成的理论图式，也完全具有解释西方或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经验现象的可能。事实上，东方和西方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的不同，以往在西方形成的理论图式和未来在东方形成的理论图式的差异，可能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触摸到的人类不同的发展侧面而已。

社会变迁：中国理论的西方超越之努力

□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中国人有能力挑战西方社会学的纪念碑式人物，并且建构超越他们的理论吗？”这是2000年后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我这儿所说的纪念碑式的人物包括西方社会学形成时期出现的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和涂尔干，在20世纪中叶出现的摩尔（Moore）、布罗代尔（Braudel）和麦克尼尔（McNeil），以及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梯利（Tilly）、曼恩（Mann）和苏威尔（Sewell）等人。这些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主要研究都旨在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西方的产生及其后果，以及人类社会的长时段变化规律这两个横跨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问题作出回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尚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

难道中国人就只有追随能力吗？带着一种不服气的精神，我发起了一个对于自己的挑战。具体说就是，从2002年开始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了中华文明近三千年的发展规律，研究的核心就是要解答以下的疑问：为什么秦朝以后的中国能在较长的时间段中保持着—个地域逐渐扩大、凝聚力趋于增强的农业帝国状态，以及为什么宋朝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长时间都很发达，但工业资本主义却出现在西方世界？我的目标是通过这个研究来建立一个能对西方也具有纪念碑意义的社会变迁理论。我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一部题为《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理论》的专著，并且引来了包括曼恩、苏威尔、豪（Hall）、古德斯通（Goldstone）、王国斌等多位历史社会学名家的评论。但是，本文并不是想要论证我的社会变迁理论是否真正超越了西方同类理论，而只是想粗略介绍一下我的社会变迁理论，以及我在建立此理论的时候动用了哪些理论资源。

要对—个文明长达近三千年的历史动态进行分析，并就此提出—个社会变迁理论，我们首先要对时间的规律作出—个判断。这儿要交代—下，历史

社会学在当下中国突然成了显学，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尚处在初期，国内学者对该学科的理解有一定误区也在所难免。国内学者一般会认为历史社会学是—门研究发生在长远过去的社会学分支，并且全面运用第一手材料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我这儿不能完全展开，但是—个直接的回答就是：历史社会学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所研究的事情发生在过去还是现在，也不在于我们用的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资料，而在于它在方法论上的特殊性。简单说，历史社会学所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有机结合。这个结合非常困难，可以说充满各种紧张，而紧张的重要来源就是我们对于时间规律的认识。

目前存在的关于时间的哲学主要有三大类：—是循环时间。这是—个在犹太教兴起之前人类的普遍时间观。原因很简单，古代人所能看到的大量现象，从日落日出、四季循环到代际交替都呈现了循环性。二是线性时间，或者说目的论时间。这类时间观随着犹太教在罗马帝国的发展以及基督教的扩展而扩张。17世纪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世俗意识形态，并且西方人越来越充满自信。特别是在18—19世纪，西方学者创造了各种世俗线性史观。三是多元时间。世俗线性时间给人类社会包括西方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祸害，因此在二战后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后，—种否定社会结构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历史的多元性和偶然性，把历史走向看作是由各种具有很大偶然性的“分水岭”和“转折点”事件串联起来的理论，逐渐在西方成为主流。

具有不同时间观的学者显然会对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结合有不同看法。简单说就是，持有循环史观的社会学家会强调造成历史循环的机制性规律。比如，—个社会在歌舞升平后其凝聚力就会下降，而凝聚力下降所带来的危机则反过来会促进凝聚力的上升。又比如人口上升后所造成的流行病、失业、移民、叛乱和战争会导致人口下降，而人口下降后产生的一系列活动变化又会促使人口回升。持有线性史观的学者则会强调—些结构性力量比如生产关系或者战争对历史进程的线性影响。持多元史观的学者则会强调各种重要

事件和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三个历史社会学“流派”的背后都产生了大家，并且各自都提出大量的能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

因此，要突破西方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我们首先要从时间观上作出突破。我的做法是：第一，引入老子的道家时间观；第二，改造韦伯和曼恩的社会变迁理论。

西方的循环时间观绝大多数都是机械循环。在他们的眼里，社会周期就如同钟摆，或者说上下变化都遵从着同一规律，就如我在前面所介绍的人口循环认同感循环两个最为著名的“世俗循环”规律。老子的道家时间观则告诉我们如下的道理：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们变得强大，削弱它们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道家时间观下，每次加强和削弱一个强大组织、思想和制度的社会力量 and 机制并不需要相同。具体的例子就是：虽然中国朝代交替呈现了循环性，但是每一个朝代兴亡的原因其实很不相同。这就是为什么老子会强调可道的“道”，都肯定不是在任何时空中都具有同样重要性并且有着同样作用方式的“常道”。道家时间观的这一特色使它明显区别于西方哲学中的机械循环理论。道家的循环时间可以说是一种辩证时间，但是道家辩证时间中的时间并不具有目的性。道家时间的关键在于转化和否定，而不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这一点要比黑格尔高明得多。比如，春秋时期楚国非常强大，但是战国时的楚国却是一个地域巨大的弱国。对于这种现象我不仅仅会从战国时期楚国出现的各种问题中找到回答，更会把楚国的积弱根源追述到楚国在春秋时代的各项改革政策的成功。

曼恩的社会变迁理论基于韦伯的理论。韦伯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分析人类社会活动的三个相互关联、却不可互相替代的视角。在韦伯理论的基础之上，曼恩提出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四个理想性的来源。曼恩的这一理论与我从生物学层面对人性的理解非常契合。人和猿在行为方式上比较接近。猿是政治动物，人也是；猿是地域性动物，为了维护或扩张自己的地盘不惜动武，人也如此；有些猿还能制造简单工具来更有效地获取食物，人则大大发

展了这一特长，或者说二者都是经济动物。人和猿的最大区别在于思想性。猿不会论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也不会产生诸如死后进“天堂”这样的想象，但是人会。对于人来说，经济/物质资源、地域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稀缺资源。人总是有穷有富；一个地域一旦被一部分人占据，其他人群在这一地域上的活动就可能受限制；有人能成为大人物，有人就只能当小人物。因为资源稀缺，为了获取这些资源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竞争，或者说人类同时又是一个主宰欲望很强的竞争性的动物。不难理解，人类的竞争主要围绕经济、军事（地域）、意识形态和政治这四个面向展开。这四个面向的竞争有着不同的逻辑，从而给了历史不同的时间性。

比如，理想状态的经济和军事竞争有两个共同点。第一，经济和军事层面的竞争有着清晰的输赢准则。第二，要在军事和经济竞争中胜出，竞争的各方都试图组织得比对手好，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比对手高，生产成本比对手小。如果说这两点能成立，我们就能得出以下两个对时间/历史具有结构化意义的推论：其一，经济和军事竞争因为有着清晰的输赢准则，因此会促进工具理性（即一种以最有效达到目的为目标的思维方式）精神在一个社会的发展，并且这两类竞争在某个社会中越重要，工具理性在那个社会就越具有主导性。其二，竞争各方不断增长的组织和生产能力给了历史积累发展性，或者说历史是具有方向性的。这也就是说当前西方盛行的无方向性的多元时间观是有误的。显然，历史的积累发展速度取决于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在一个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竞争的迭代长度。这里迭代长度指的是竞争各方在一轮竞争输赢分明后，进入下一轮并且一轮又一轮竞争的总次数。迭代越长，历史积累发展持续得越久，发展的速度也可能越快。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科技、军事、经济和组织能力上的高度发展，以及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科技、军事、生产能力和组织水平的飞速提高，都是经济和军事竞争长期主导而带来的非预期后果。

—

但是，历史的积累发展速度是非常不同的，这

是因为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有着不同的性质。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会更多介绍意识形态的性质。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犹如两个互相不明对方身份的人在进行辩论，其本身并不产生任何物质上和组织制度上的东西，或者说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不会促进历史的积累发展。因此，意识形态竞争在一个国家中越重要，该国家的积累发展就可能会越缓慢，甚至出现停滞不前和倒退。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又像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在进行辩论，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辩论的各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并且一场辩论过后，各方都会自以为赢了。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竞争没有明确的输赢准则。意识形态还有两个性质：其一，意识形态是一种劝说性权力，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其二，人们对某意识形态的理解总是基于自己的特殊经历和人生体验。意识形态的这两个性质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非常多元的。

意识形态竞争不促进积累性发展，没有清晰的输赢准则，具有高度多元性，这是人类社会高度多样性和多重时间性的最为主要的来源。从认知角度来说，目前西方世界盛行的无方向性的多元史观的问题，就出在把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性质而造就的历史的高度多样性当成了全部历史事实。

某一意识形态有时会占据上风甚至是绝对上风。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一占据主导的意识形态更接近事实或真理，或者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而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寻找背后的非意识形态因素：一是某种强制力量的支持；二是灾难后的短暂共识。

理想型的政治竞争在现实世界很难找到相近的例子。不过，如果这个世界有一种不能依靠任何组织和资源以及不能讲意识形态的竞选，那么这个竞选就接近于理想型的政治竞争了。理想型的政治竞争有比较清晰的输赢准则（比如总统选举中只有一个人能当上总统，而没有被选上的人应该知道自己是失败的一方），能促进工具理性文化在社会上的发展。但理想型的政治竞争与物质生产没有关系，不会促进社会在物质上的积累性发展。如果政治竞争在某个社会占据了主导，该社会的积累性发展也会缓慢。如果说意识形态的性质造成了时间的多样性，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代表则是造成意识形态在

时间过程中消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强制性力量。当国家推崇某一个宗教或者世俗意识形态时，该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就不再是教主的胡诌或者是知识分子的乱扯，而是一个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但是，某一意识形态和宗教一旦受到国家力量的推行，其负面性也就会被不断放大，为一个新的危机的到来或新的历史循环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因此，历史时间具有很大的积累发展性或者说方向性，但是历史时间的方向性来自于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的性质，而不是任何既定的具有道德意义的目的。历史又是多元的，历史的积累发展的节奏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历史也可以出现积累发展意义上的倒退。历史的多样性和积累发展节奏，历史方向的多变，来自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的性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背后的不同规律之间的相互拉扯给了历史明显的循环性，但是历史循环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循环，而是道家辩证循环。

人作为社会行动者在历史时间上起的是什么作用呢？简单说就是，大量的个人和组织在历史画卷上涂鸦，并且还会试图用各种意识形态来论证他们在做着“最美最好的画”，同时通过他们所掌握的大小不等的权力和资源把各自的意志往下贯彻，从而给历史制造了只会把后人脑袋搞晕的历史形态和历史材料上的无穷多样性。

然而，我以上所介绍的这些积累发展的、多元的、循环的时间结构毕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并且在超越了个人作用和各种部分事实的长时段历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只有懂得这些规律，我们才能较好地理解和把握在历史进程中某些个人和组织的作用，为历史学分析和历史社会学分析建立一个较为牢靠的出发点。

社会科学家的视野很难脱离个人的人生经历。就我来说，“文革”前后的苦难和磨练给了我一个不同于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西方学者的人生体验，出国后的阅历给了我一个世界性的视野，而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历的一波三折以及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给了我反思、从容和自信。我其实并不确切知道我的学术努力是否成功，或者说有多大的成功。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说，不服气的精神和攀登最高峰的企图心是不能没有的。

面子：从本土研究反观现代学术

□翟学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自改革开放以来重新起步，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文献化，即把学问理解成对既有文本的研究，而忽略现实生活。二是西化，即研究者倾向用某种西方的理论、流派与方法去处理这些文献，并视作研究的正宗。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兴起的社会科学本土化以一种极其微弱的风声吹进了中国大陆，我无意间受到了它的影响，确立了对“面子”问题的研究。当时想做这个题目的冲动远大于这个题目自身潜在的困扰，比如这个题目无论做成什么样，都意味着它完全不符合中国学界业已形成的学术氛围——文献化与西化。或许更大的学术风险是，面子研究很难被当成学术研究看，因为这样的研究是要把中国人鲜活的日常生活带进学术。但面子研究又非常重要，它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而言意义非凡，若能有所突破，还将挑战国民性研究、定量研究、西方相关理论等，进而也可能形成本土的理论模式。

如何研究面子

以往讨论面子问题的人大多是文人、作家、观察家等。他们零星地议论过面子的重要性，把它当作中国人的“第一特征”或中国人的“精神纲领”之类。相应地，一些从事田野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家也关注到这一现象。但此议题从未在学术中受到过重视。深究其原因，除了它不具有学术文献性特征且缺少一种西化的理论观照以外，还有一种误区，即它在文人的带动下已被当作国民性来看待了。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认识，非但没有推动面子研究成为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还使其止步不前。

国民性研究若回到西方学术来看，其基本方式方法主要是描述、统计和测量，前者人文学者更加擅长，而后者却困难重重。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特征，研究者们很想知道面子究竟是大多数国民拥有的、认可的、惯常的行为方式还是相反。国民性的研究思考来自于我们通过文献（各种报道

加议论等）来总结中国人的特征，然后将这些特征量化以获得统计学上的了解。但研究者为此将遭遇到的问题很多：首先，这里的统计样本以多大为宜？显然，国民性的统计研究对拥有十来亿且含有地区文化差异的人口而言很难实施。所谓多数人格看起来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但在实际操作中，究竟多大的样本量可以达到对国民性的认识，恐怕没有人可以回答。更不用说，如果不得已将其集中在某一地区研究，将涉及效度问题；如果将调查遍布全国，那么样本再大，一个数以千万人口的地区也平摊不到几十个人，能说明什么？其次，面子是什么意思也不很清楚，这关乎信度。如果说我们想测量面子特征，那么什么样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表现不是？比如，中国人通常说“人情面子”，那么人情是面子或面子是人情吗？它们是什么关系，我们研究面子的时候会附上研究人情吗？再比如，中国人常把面子也说成“脸面”，那么“脸”是“面子”吗？或者说，研究了“脸”就等于研究了“面子”吗？可见，面子作为中国人的特征，是一种现象上的、感觉上的、意义上的表达，当我们真的打算对其做学术研究时，如果上述问题没有解决，什么访谈、问卷或者统计分析都是无法完成的。最后，将面子归结为中国人的特征，这种定位使得面子研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人类学？心理学？抑或社会学？

20世纪50年代，有关面子的含义及其意义的人文议论，曾大大地激发过一位西方重要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思考。他的戏剧论的源头得益于对“面子”的开发（当我得知这一学术关联后大吃一惊）。的确，所谓“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难道不就是“脸面”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吗？为什么一种被中国学术弃用的生活现象可以在西方社会学体系中开放出绚丽的花朵？是什么使得这样一个概念在西方社会学体系中获得重生，甚至被当作一个重要的西方理论再介绍给中国人？如果是同样的问题让中国人来思考又会是什么样子和什么结果？戈夫曼的研究在西方社会学中被归结为现象学式的。这样的研究方式避开了我们想关注的人口数量、地区差异、信度效度、概念自身的操作化等。他在面子概念中看到的是一种分析社会的视角和框架，借用这样一种框架，可以获得对社会构成的一种理解。坦率地说，我对面子的研究，不是从戏

剧论开始的,更不知道现象学社会学。当时的我仅了解戏剧论本身,完全回溯不到脸面上去。而当获悉了这样的连接关系后,我彷徨了很长时间,真正感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强大。的确,我自己一步步建立起来的脸面模式,与戈夫曼的理论有惊人的相似(虽然我们使用的概念有差异,但基本点相同),但戈氏的理论早于我30年。这一点深刻地告诫我,做研究之前必须知道这一方面已经达到的研究高度。由此,如何继续面子研究,极富挑战意味。

从“国民性”到“行为法则”

迎接这一挑战的主要路径正是本土性的研究。面子原本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概念,当它全球化的时候,戈夫曼想建立的理论是普遍性的。而当它以“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面貌出现后,面子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演化成一个表演者的“印象整饰”。由此,面子的含义是从自我到面具、再从角色到面对观众表演的过程,或者说它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比如“印象形成”。但所谓本土研究就是先回到自己的文化与语用学中去考察“面子”的基本含义。当然这点见仁见智。如果本土性研究也需要建立自己的视角和方法论,我认为面子需要摆脱的正是其被作为国民性的研究(更不应该先被定义为陋习)。这是因为国民性的研究在学术中已经归属于心理学或人类学中的人格研究,很容易限定我们总是想从“性格”意义上来寻求面子的含义;或者说,想从“面孔”引申含义上来寻求它的特征。

以面孔引申出的面具或者人格在中国文化中其实更多的是“脸”的含义。如果我们把脸和面子混为一谈,那么脸就成了面子。但中国人分别表达这两者是有奥妙的。这个奥妙之处就在于由“脸”(颜或颜面)延伸出来的“面子”含义不是落在个体身上,而是落在了关系方面。我们可以说,以中国文化传统的表现方式来看,无论脸还是面子,都是一种隐喻,是以“面孔”来隐喻一种社会的生活状态及其意义,而非单纯表示为一个人的形象。所谓“人活一张脸”,不是指人要爱惜他生理上的那张脸,而是指他要融入到整个社会文化共同建构起来的一种价值体系当中去。作为一种隐喻,脸连接了个体的各种天然、社会、文化资源,而面子连接

了关系或者互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及仪式性特征。因此,关注“脸”,我们充其量研究的是个体性的表达方面,而重视“面子”,将会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关系的表现方面。可见,如果研究重点是放在“脸”上,那么中国概念中的“脸”与戏剧论基本一致;如果重点是在“面子”上,那么我们恰恰看到了戏剧论的缺失。

首先从语言上看,因为“脸”和“面子”已经合并成了英文的一个单词 face。这一合并意味着“脸”和“面子”的关系消失了,它只给出了同质性的特征,再也不可能考虑其间的复杂性。从 face 来理解人们的社会生活,其实就是“自我”展现出来的生活,无论这样的展现是掩饰性的,还是解放性的,都是如此。因此,face 对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而言,其价值在于“自我”如何表达。这便完成了由中国概念向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最核心问题的回归。

但中国人的生活并非如此。这里需要先讨论的问题是,当我们说中国人的生活并非如此的时候,不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回答有多少中国人不是如此,或反之又有多少中国人是如此。我这里所谓中国人的生活不是如此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在关系中所形成的行为法则中没有自我的议题以及如何展示的议题。诚然,儒家或者道家中有所谓修身或修养的议题,但修身和修养不同于自我及其展示。也就是说,个体想自我展示什么也不需要关乎修身或修养,当然“有”也更好。可见,不从数量上考察有多少中国人如何有或没有,将意味着研究方式、方法的转移,也就是面子的研究应该是中国人行为法则的研究。行为法则的研究不讨论这样的问题,比如难道在中国人当中就没有展示自我者、直言不讳者、我行我素者、随心所欲者或放荡不羁者吗?回答是当然“有”。可回答了“有”或“有多少”并没有回答中国人的行为法则。作为一套运行于社会之中的行为法则,不善于此乃至反叛者都大有人在,但又有何妨?当他们知道社会的行为法则是人情面子时,他会知道他的拒绝或反叛会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就是行为法则的力量。

面子理论

诚然,面子被看作行为法则并没有脱离戏剧论太

远，戈夫曼的理论框架也是在互动原理层面上说的。那么真正能够摆脱该理论的，正是中国人的面子理论，其要旨不是从“自我”出发，而是从“关系”出发。回到文化根源上看，擅长于从自我出发的理论思考是个人主义文化的思考；可人情与面子的文化源头都来自于“关系”的假定，也可以说是“仁”的假定。当然，“仁”思想的假定背后之文化是“家”或“血缘”所必须强调的关系结构，而不是个体本身。换句话说，关系的社会前提是要求个人不能考虑自己怎么活，而是要考虑如何在相互依赖中寻求一套活法。虽然作为印象整饰的脸面行为是所有社会里的个人都有的现象，这一点连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中也有所涉及，但对中国社会而言是远远不够的。面子的活法在极大的或者更重要的程度上是为他人所活着的，比如一个人的成就被说成是光宗耀祖，或者一个原本无成就动机之人，正因为有了光大门楣或者为国争光的驱动力才有了成就动机。反之，面子上的失败也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一切相关者的失败。或许作为个人一种行为的失败是可以承受的，但联系到相关者的失败则往往无法承受，因为在这样的社会，我们会把面子理解为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许多相关者的事，不是自己想了结就了结了，而是相关者答不答应可以这样了结。

理解了关系的重要性，才可以理解面子的重要性；而非理解了个人自我，才可以理解面子的重要性。这即表明，以关系为面子运行的前提假定和以自我为面子运行的前提假定，所运行出来的社会是不一样的。前者的理论逻辑在于当一种关系成立的时候，面子运行的条件才具备；后者的理论逻辑是，面子运行的前提不需要关系，完全可以从自我开始。当然，从自我开始运行出来的面子也会建立关系，也就是戏剧论中的“观众”。但观众为何会喜欢表演者？因为表演者演得精彩。表演者为何演得精彩？因为表演者很好地处理了自我与表演角色之间的把控。如果回到关系社会中去提问，观众为何会喜欢表演者？有一种明显的表征是这些观众是来捧场的，为何这些观众要来捧场？因为他们和表演者是老相识，如自家人、老乡、同学、好朋友等。那么表演者演得如何？回答是“很好”，但这个很好的意味未必指表演者演得好，而是指因为他们关系好，无

论表演者演得好不好，都得说好。由此逻辑可以很清楚地发现，戏剧论所提供的看社会框架始终是一个自我展示，或者角色表演的框架，虽然其中会涉及与戏班或者观众的互动关系，但是其理论的重心是落在表演者身上的；而中国人的面子理论是一种捧场的理论，表演者或者角色的自我展现相对次要，重要的是演员与观众之间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乃至于谋划出什么样的面上效果。在捧场理论中，演出效果可以是真实的，但也很容易倒向吹捧的、抬举的，质言之，就是给面子的。给面子的运行模式一旦出现，将导致社会运行不重视社会品质，虽然该社会也有人会为此付出努力，但由于这样的努力不是社会运行的要求，而是自己的人格特质或者偏好，进而导致更多的社会成员会将其精力用于建立关系方面，即符合于行为法则。或者说，这样的社会不停地在提醒其成员：做得好，不如关系好。一个人演得好，与观众关系不好，结局也不好；反之，演不好，但关系好，结局就好。这就是关系运作的分析框架，也是面子研究的理论贡献。

由此反观许多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现象，我们通过面子理论都获得了理解或解释。首先我们看到儒家思想内在的矛盾性，也就是关系与人品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儒家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其次，中国社会的关系运作一旦配合着等级、权威、共同合力，将极大地导致权力的彰显与批判性减弱。再次，这样的社会很容易被假象所迷惑，或者说，面子使得人们很难分辨这个社会的虚实。又次，这样的社会也会名实分离，也就是你自以为看到的并不是你真的看到的。最后，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面子理论是社会学中的微观理论，它的属性在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都可以适用，比如个人、家庭、家乡、学校、单位可以有面子问题，而地区、国家和国际关系之间也会有面子问题。

我个人以为，面子理论的提出，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它说明本土概念是可以开发的，本土性可以被西方理论所接受，也可以重新被本土化所挖掘和再建立，并构成与西方相关理论的对话关系。与此同时，本土研究还可以实现学术自信与文化自觉，可以有理论突破。它不但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认识，也可以面向世界。

理论自觉与实践建构： 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学科使命

□徐永祥，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汇贤讲席教授”

—

社会学、社会工作学是两个既有自己个性特点，关联度又非常紧密的学科。在欧美发达国家，尤其在美国，社会工作学科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学的学科，更强调与社会福利学、医学、心理学的联系，其规模（研究人员、科研课题的数量和体量等）也都远远大于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学自诞生以来就是天然、内在联系在一起，且二者都重视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经济学、社会福利、医学、心理学等）的跨学科联系。虽然中外有着不少差别，但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科的共同点也是明显的，即都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产物，都是以“社会”为中心，研究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问题、追求社会秩序与团结、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群众福祉的科学门类。

可以说，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是社会学、社会工作学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进程及其成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社会学、社会工作学及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发育和发展程度。早在上个世纪初叶，伴随着近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在我国沿海地带的初步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就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一些大学逐渐兴起。1914年，上海沪江大学最早设立了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学的课程。1917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又最早开设社会工作课程，同年在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上海杨树浦地区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实习和服务机构——沪东公社（英文为 Yangshupu Social Center）。之后，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纷纷建立社会学科，并讲授社会工作课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学者深入城市和乡村或开展社会调查，或开展社会服务，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产生了诸如费孝通、雷洁琼等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工作学家。但毋庸讳言的

是，那时我国市场规模还极其狭小，市场经济的体系还未建立，农业社会的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加之日本侵华战争及之后的国共内战，故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学始终难以发展壮大，学科规模极小，专业人才极少，对现实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用“微乎其微”或“微不足道”来概括。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校在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逐步取消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和专业，有关教学科研人员也相继被遣散、安置到其他专业。这一现象的表层原因在于，管理层当时对社会学阶级属性的认识不无偏差，也有“左”的错误。但深层的原因则在于，1950年代我国在工业化和社会改造中逐步取消了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了政府大包大揽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单位人的社会福利与管理体制，客观上消解了社区、社会组织等存在的土壤，也消解了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生成与发展的客观条件。

1978年我国开启了举世瞩目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迅速转变成市场经济的40年，是从农业社会迅速转变为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40年，也是人民日益富裕的40年。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包括社会学、社会工作在内的社会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建与发展的客观基础、内生动力与发展机遇，并且在社会发展和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改革开放赋予了我国重建、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必要条件。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作出了“恢复与重建”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指示。1981年以来，少数大学开办或重建了社会学专业。这以后重建社会工作专业的呼声日益高涨，教育部于1988年批准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试办社会工作专业。不过，在1993年之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初期的“摸着石子过河”的鲜明特征，在顶层设计上对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直游移不定，故而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在外围兜圈子，并未涉及政企关系和企社关系，计划经济制度及单位人的社会管理体制并未有根本突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结构与社会分

层的变化尚不明显，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的研究需求和人才需求尚未凸显，高校对设置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动力明显不足，开办专业的学校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社会学及社会工作整体上还处于知晓度极低的“冷门学科”。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吹响了再一次解放思想的号角。紧接着，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于1993年11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自此以后，我国进入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新阶段，单位人的社会管理与社会福利体制也随之走向瓦解。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单位制的瓦解，使得我国社会结构快速分化，体制内的人口急剧减少，体制外的人口急剧增加，且原子化、碎片化、无组织化的特征及问题极其鲜明。

社会层面的这些新变化及其变化过程，呼唤着新的社会组织、新的社会服务以及专业的社会支持，以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团结和社会建设，从而为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理论研究、政策倡导及实践建构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正因为此，1993年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学的学科队伍不断扩大，学科体系日益完善，学科知晓度、社会认同度也愈益提高。例如，今天学科设置已发展到7个二级学科——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工作、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且已形成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学术研究方面，社会学、社会工作学今天关注的课题也几乎覆盖了宏观社会、中观社会、微观社会等所有领域的发展和问题，如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与社区建设、社会治理与社区发展、城乡差别与融合、社会组织、社会服务、社会分层、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贫富差距、反贫困与脱贫攻坚、婚姻与家庭、儿童与妇女、老龄化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如农村“三留守人群”、困境儿童、残疾人、农民工、失业职工）、犯罪与特殊群体问题，等等。

可以说，改革开放第二阶段以来，我国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研究领域及其成果，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它在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象、研究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倡导社会公平与

正义等方面，正在发挥着愈益重要的科学研究功能。值得重视的是，与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相比，以及与社会学学科内的其他二级学科相比，近二十年来社会工作学科全面、深刻、系统、正向地影响了我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在为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推动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创新，倡导社会政策和发展社会组织，建构社会服务体系及社会政策等方面，正在发挥愈益重要的实践建构功能。此外，二者也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研究人才、建设人才和治理人才，为国内外各界人士认识中国的变化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文献。

三

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学在短短的40年里之所以获得这么快的发展，关键在于不断地走向学科自省、理论自觉和能动建构。

回顾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学、社会工作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西方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经典著作，介绍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尝试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我国的现实社会问题是当时流行的研究倾向。这种不加区别的“拿来主义”由于无法真实反映和解释问题的本质所在，往往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学界开始了学科自省或学科反思。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早提出了“文化自觉”^[1]，虽然这个概念在他的解释中还比较含糊，但其蕴含的新思想、注重传统文化挖掘的主张却是极其宝贵的指引，促使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社会工作学者开始了学科自省和反思。到了本世纪初，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进一步提出了“理论自觉”的命题，倡导与鼓励“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作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对‘中国经验’作出自己的理论提升”。^[2]

正是在“文化自觉”特别是“理论自觉”命题的启示下，我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的学科自觉性和学科主体性越来越强，其突出表现为不再满足于简单运用西方的理论去解释现实问题，而开始注重对社会现象和社会实践进行中国自己的理论提升和理论建构。例如上世纪90年代对“单位制度”“农

民工”和“社区建设”“文明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创新”的理论阐释和建构，本世纪以来对“社会建设”“社会体制及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社会服务体系”等概念和理论的阐释与建构。可以说，所有这些概念和理论都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后所取得的原创性贡献，也是世界社会学共同体内中国话语的有力表征。

马克思主义强调自己的理论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这就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建构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除了创新意义上的理论建构和学术话语建构之外，也必然表现在实践层面上能动的政策倡导和社会建构，即通过学者们的理论创新去推动社会领域的制度、体制、政策、组织和社会服务体系等的创新与建构。在这方面，具有行动科学特征的社会工作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本世纪以来，社会工作学者们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模式，即作为理论研究者、政策倡导者、实践参与者于一体的角色，先后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西部地区，经由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引领，成功地推动了新的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改变了管理层以往对民间组织（现在叫社会组织）的担忧性认识，推动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创新，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基层政府社会职能的逐步转变。

可见，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是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得以重建发展的最深刻的客观背景，而理论自觉和实践建构则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得以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之所在。也正是有赖于这种理论自觉和实践建构，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才得以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实践功能的、能与国际对话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

四

今天，我们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征程。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去展望未来，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界的历史使命就在于，自觉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能动地践行理论自觉与实践建构的责任，进一步推动理论与学术创新，以更好地解释、反映和服务我国的社会发展、

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更好地服务于提升我国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任务。以下几个方面当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理论自觉与实践建构需要重点想象和思考的话题：

第一，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去认识我国经济、政治、社会三者基本关系格局的变化。1978年，邓小平根据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平与发展的当今时代主题，立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判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命题。在总结以往左倾错误教训的基础上，在我国还没解决好人民吃饭问题的情况下，邓小平及时指出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此后，经济建设便确立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中心，而其他领域则需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展开，或者说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和全局。问题在于，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我国人民日益富裕起来、教育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经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和发展格局的中心，是否有必要做出适当的调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民主法治三者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是否具有可持续的能力？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的社会发展理论该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去解释这种可能的调整？

笔者以为，要回答好这些问题，一要深刻领会习近平的一系列论述，特别是关于主要矛盾转化和人民为中心的论述；二要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三要考虑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中国话语权的提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据此，笔者提出这样一个可供讨论的观点，即应该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社会发展为中心，民主法治为保障”作为今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主线。这里的逻辑在于，经济建设是决定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民主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然而，经济建设或经

济增长并不是根本目的,而是为了社会更好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追求。政治建设抑或民主法治的发展则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中,经济、政治、社会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而文化与生态文明属于技术、辅助性的序列。不仅如此,文化具有经济和价值双重属性,并不具有实体性地位,其中文化产业部分可归属于市场经济,价值或意识形态部分可归属于或体现于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方方面面。

第二,应立足自己学科的“社会”属性,在研究中国和世界社会问题的同时,做好理论自觉和理论建构的大文章。这里有三个议题尤其需要我们关注:首先,为了更好地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建议,需要我们去研究与社会相关联的经济、政治问题,或者说在社会与市场、国家的关系中来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但是,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不应也不能偏离社会研究的主题,不可搞成纯经济学、纯管理学、纯政治学的研究。不可否认,在过往社会学特别是一些分支学科研究中,这种拿着自己的铁耙去别人田里干活的问题确实存在,其结果不仅模糊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且难以让自己成为被其他学科所认可的“显学”。其次,需要我们更多地关注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社会事实”,加强对以往社会学比较忽视的“体制内”人群和“体制外”人群的研究,包括他们特殊的社会问题(如社会分层、社会隔离、群体关系)及其所需要的社会政策、社会支持、社会团结,等等。再次,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参照而不是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我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例如,诸如社会分化、社会分层、中等收入、贫富差距等问题的研究及基尼系数的运用,简单照搬西方已有的理论和模式实难给出科学准确、令人信服的解释,必须结合我国的房地产政策及房产的价格变化来研究,因为这是制约当今我国各社会阶层及相关社会问题的一种决定性的常量和变量,也是制约我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第三,应立足自己学科的“社会”属性,致

力于实践的建构,即在实践中推动社会建构、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社会学、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实践的,这种实践品格决定了它们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首先要继续深入地推动社会体制的改革,积极建构政社分开与合作的新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分开以及社企分开,以培育和发展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类市场主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40年改革开放的一条主线。相比而言,我们党于2006年才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与1993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体制改革的时间相比大约晚了13年。不仅如此,社会体制改革在实践中至今尚未破题,政社分开与合作的主体尚未全面、清晰的形成,社会和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得并不理想,政府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现象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应该承认,这些问题与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整个社会学界的理论忽视或研究投入较少不无关系,至今未能进入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因此,加大对社会体制改革的研究,探讨这一改革的内核、动力、要素、路径、关系、意义及影响,既是理论自觉、理论建构的应有之义,也是能动性社会建构的前提。其次,要立足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切实推动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帮助基层政府提升治理社会的能力和各类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从事社会治理的能力,注重以理论引领创新实践,在实践经验中提炼和升华理论。最后,以理论研究和行动参与,积极推动社会的再组织化,建构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体系,在法治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秩序和社会团结。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6ZDA078)】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北京大学学报, 2003(3).
- [2] 郑杭生. 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 2011(2).

社会转型：社会学人对变革时代的理论回应

□文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社会学具有回应变革时代
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了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对社会学而言更是如此。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从180年前诞生之时起，其命运就与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与现代性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学知识体系本身就是知识生产的一种现代形式，它既是对现代性成长及其后果的理解和阐释，又是现代性自我发展的后果和原因之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学人天然地就与各种变迁社会和现代性成长联结在一起，他们不仅是变革时代的参与者和“阐释者”，更是变迁社会的引导者和“立法者”。

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使得社会学人在理论回应变革时代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门从社会整体出发，综合研究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各种社会现象变化发展规律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学不仅具有综合性、广泛性和整体性的学科特征，更重要的是其一直坚守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学科特质，为提升社会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地位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不仅如此，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来自社会实践又反过来参与到社会实践建构中去的品质，使其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影响力和作用，不仅停留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生活，而且构成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在理论上的积累和在经验上的发现给人们提供了开启理解可能世界和回应变革时代的钥匙。因此，优秀的社会学人都具有拿起手中的理论工具来回应各种快速变化社会的能力。

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历程表明，越是快速变化的社会，越容易产生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就理论研究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学大致经历了“缺失-移植-融合-反思-重构”的过程。从刚刚恢复和重建时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缺失到20世纪80年代

中期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移植，为中国社会学的全面恢复与重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动力。尽管中国社会学研究一直存在着经验研究“过度化”和理论研究“疏松化”的严重弊病，但作为后发国家和后启学科，其在社会实践和学科建设上却一直是坚持东方理论与西方理论的融合与渗透，坚持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有序衔接，尤其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理论在不断增强对西方社会学反思性探索的基础上，开始重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并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也为中国社会学人能够有效地回应这个快速变革的大时代提供了理论工具。

中国社会学要想逐步接近或取得在世界社会学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或特色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社会学自恢复和重建以来，其在研究定位上就带有某种残缺，其中突出一点就是在复出伊始刻意追求经验研究的性格，但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这种显而易见的残缺在学科知识的累积中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弥补，其结果造成了所谓的经验研究、应用研究大多停留在简单运用社会调查统计技术进行描述性分析和说明的层次上，无法在理论上得以提升，在思想上得到启迪。这一症状不仅需要我们首先在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层面下功夫，而且需要我们在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社会理论上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社会学如果缺乏理论的想象和反思，就必然会沦为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的肯定，其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功能的丧失、根基的虚化和想象力的枯竭。因此，要有效回应这个变革的大时代，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从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开始。

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人的理论
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经验场域

如果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来概括中国40年来的社会变革过程，我觉得“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是再恰当不过了。它俨然成为中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在普遍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界最富有特色和代表性的学术概念之一，而且是社会学人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如果以“社会转型”

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检索，从1987年第一篇带有“社会转型”篇名的论文开始，到2018年11月底，30年来有超过2万篇相关主题的论文涉及对“社会转型”的论述，尤其是2000年以后，该类论文每年都呈现出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到2014年达到顶峰为1535篇，此后几年也几乎每年维持在千篇以上的发文量。这说明中国学术界随着社会转型实践的持续深化，需要理论上的回应和支撑的急迫程度也在快速提升。虽然“社会转型”一词并不是最早来源于中国学术界，而是源于西方早期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转型”也只是社会学家对生物学概念的一个借用（早期社会学的很多概念都是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概念的借用），但中国社会学家却从中国社会转型实践出发，赋予了“社会转型”更丰富的内涵，并由此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理论研究范式甚至转型社会学这样不同于传统西方发展社会学的新学科方向，以此来回应我们这个快速变革的大时代。“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相比，少了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判断，更多的是强调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的变化。“转型”之“转”可以以一种方向上的改变和不确定性，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那种线性的延续关系，使得“社会转型”研究能够突破传统“发展研究”的局限，从而专注于研究当下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

“社会转型”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为基础而开展的一个重要理论研究领域。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更多的是共性。因此我认为，对社会转型的相关理论研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转型研究范式，可以看作中国社会学家对中国40年来这一变革时代的一种重大理论回应。在社会学家看来，“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客观呈现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问题，更意味着孕育一种新社会结构的诞生与重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领域的各个领域都卷入了急剧的社会转型之中，社会转型的实践特质使其更偏向于发展过程中的断裂而非连续性、冲突而非稳定性、差异而非同一性。在当代中国，伴随着4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

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且日益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社会类型，这一社会类型既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社会，也不同于现代社会，而是兼具传统与现代双重特性的“转型社会”（transforming society）。从传统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来看，其“发展”取向上的单向度性及其相对固化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使得以往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而更具备中性取向的“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研究则有利于从单向度的趋同化取向中摆脱出来，使其在价值取向上更具差异性和多元化。毫无疑问，“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这些新的概念，对于描述和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在整体上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家对这个变革时代的一种理论回应和学术努力。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社会转型研究与 转型社会学的兴起

当前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学研究也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双重推动导致对各种新范式、新理论的探索不断涌现。作为对变革时代的一种理论回应，中国社会学家实际上已经卷入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洪流之中，并为构建一种新的理论关怀或研究范式奠定了实践基础。这种理论回应不是简单的片段式或者碎片化的理论观点陈述，而是一种构成研究范式的系统性理论回应。这种理论回应不仅依赖于研究的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的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就中国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实践而言，我认为要加强社会学的理论回应和范式创新，首先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努力，有明确的理论自觉和范式创新意识。新的理论范式的生成不是某个学者单一的学术行为，而是某个学术共同体自觉开展学术创新活动而进行的集体行动。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社会转型研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转型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家而言更是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不仅在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经验本身就具有了某些

“转型社会”的特质，更在于其在传承与发展以往转型研究的过程中愈来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研究范式。比如，在以往的社会转型研究中，既有专注于“传统与现代”这一宏大主线的社会转型总体性研究，也有基于市场转型、文化转型、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等具体领域的社会转型研究，还有导向可持续发展或面向信息化、全球化趋势的社会转型研究。这些研究背后隐藏的是社会转型理论研究正在走向深入和细化的逻辑主线，也是学者们对不同类型的社会转型实践不断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

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独特性而言，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转型目标上强调多元共享性发展；（2）在转型路径上呈现出渐进性的变革；（3）在转型方式上主要体现为冲突性的协进；（4）在转型结构上表现为异质性的共存；（5）在转型动力上突出“以人中心”的人本性驱动。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些特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上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以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的经济发展为中心，慢慢演化为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变革为中心的转型社会，同时又开始在某些方面迈向了新的以社会文化和人的心理情感为关注点的社会。这种社会转型是一种由外显型社会逐步转向为内生型社会的发展过程。所以，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转型研究范式和新的转型社会学，其不仅要対过去的社会转型现象和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实践进行理论分析，更要密切关注和预判即将发生的重大社会转型趋势，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尤其是新的转型社会学奠定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有效回应中国社会转型与时代变革方面，我们至少已经具备了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思想文化传统可以为我们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元素。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一直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观念，突出身心和谐、兼容并蓄、见利思义等思想，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打破西方长期以来占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流地位的“二元”思维模式，而且对我们系统性地认识丰富多样的当代社会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元素，也为我们进一步辩证地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切入路径。二是处于转型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为中国特色

社会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研究场所。伴随着当代中国的快速转型，各种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这不仅会刺激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快速成长，而且会导致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的产生，从而为各种新理论、新范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是日益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各种跨学科资源的运用，将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形成提供很好的技术保障。目前，中国社会学不仅可以利用日益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快速拉近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学术研究上的种种差距，而且可以凭借自己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今得天独厚的经验研究环境取得社会学研究中的“后发优势”。同时，随着当今各种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日益兴起，各种跨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运用越来越多，中国社会学研究完全可以利用本土的思想资源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理论与方法的创造性转换，创造性地开辟自己新的研究领域与新的研究范式，从而为最终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学派创造条件。

当然，理论回应和范式创新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理论的创新与范式的转换，这需要巨大的理论探索勇气和决心。对此，中国社会学人必须培养联合攻关、协同作战的“集体意识”，以在不同研究领域推动形成具有不同中国特色的各种“中国学派”，回应日益丰富和变化复杂的转型社会。同时，也要具备将社会学知识反思性地运用到对现实社会的建构之中，从而“引导”与“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事实”的能力，而不只是充当一个“解释者”的角色。为此，中国社会学人仍然需要不断强化自己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信心，在逐步自觉实现从“阐释者”到“立法者”的角色转变过程中，通过为社会和学术“立法”来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和学术发展，以不辜负大变革时代留给社会学人的生动的社会实践和丰富的学术资源。【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包容性城市发展思路研究”；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社会转型的中国实践与转型社会学的建构”】

从控制到治理

——探索一种“权力关系”的转型

□冯钢，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国家从上至下建立了一整套以控制为目标的制度模式。从农村的人民公社到城市的单位制度，国家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有效掌控和再分配，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和整合。由于这种总体性控制模式自身的刚性特征，容易陷入一种“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循环过程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从改革初期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到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简政放权”改革措施，再到最近政府大范围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等事项，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建立权力清单制度，锁定了改革和管理的权力底数。放权对象既包括下一级政府，也包括社会和市场，并及时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与简政放权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相衔接。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成功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出现了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和以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土地经营权的土地流转制度，并且在国有企业之外产生了个体经营、私营企业、民营经济、三资企业以及各种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团体，开始了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在政府文件和公开媒体上“治理”这个概念逐渐替代了“控制”，党和政府全面强调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列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治理”（government）这个概念最初大约是在16世纪欧洲出现。当时欧洲正处于两个过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打破封建制度结构，建立领土、管理和殖民意义上的国家；另一方面，各种宗教运动都面临着个体如何在此生得到精神引领和统治才

能获得永恒的拯救的问题。相应地，西方思想界也逐渐开始改变自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以来的“习惯”，从大量的“给君主的忠告”之类的著述，转向了对“治理艺术”的探讨。一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量的相关著述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希望能够用一种治理的艺术来替代以往所热衷的关于君主如何操纵力量关系从而保持君权的那种能力。

在《治理术》中，福柯把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当作关于君主保持君权能力的代表，而反对马基雅维里的人则揭示了君主与君权关系的脆弱性，认为即使具备了保持君权的能力也并不等于就具备了国家治理能力。如果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只是从君主的角度强调君权的绝对性，那么他的批评者们已经意识到君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本身包含着国家自身的本质和存在问题，而随后产生的强调所谓“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意思就是，国家与自然一样有它自己的理性形式——虽然是一种不同种类的理性形式）的理论家们则不再去关心如何强化国王在其领土上施展权力的问题，而是关注于如何强化国家本身的问题，强调国家根据一种内在于国家的理性原则来进行治理。

二

换句话说，如果要使国家强大，那么统治就必须遵循被统治对象的本性，这就是“治理”，也就是说，“治理”包含了三个重要的特征。

首先，治理是内在于国家的多元治理。

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君主作为统治者，是国家内唯一的、并占据一个外在的和超越的位置的。而在众多关于“治理艺术”的著述中提及的治理却是内在于国家的，因而是多样化的。比如治理家庭、治理家务、治理儿童、治理地方、治理宗教秩序、治理灵魂、治理修道院等，治理实践的多样性涉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如家庭的家长、修道院的院长、儿童的父亲、学生的教师，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内在于国家的。也就是说，“治理艺术”是内在于国家的、具有多样性的治理形式。既然治理必须遵循国家的本质，那么内在于国家的特质就必定是具体的，治理的实践也必然是多样化的。“治理艺术，并不是在超验的规范、宇宙论的模型或一种‘哲学-道

三

德’的理想中寻求奠定自己的基础，而必须是在构成国家的特定的现实的东西中寻找自己理性的原则”。换言之，在治理的语境中，权力是分散在国家和社会的各种不同领域之中，并根据这些不同领域自身的特征来进行治理实践的。

其次，不同的治理形式之间是连续的。

福柯在《治理术》中以勒瓦耶给法国王太子的教育著作为例，分析了其中谈到的三种治理形式（自我治理、家庭治理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在此，治理艺术实际是在上下两个连续性中产生：向上的连续性是指君主如果想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就得学会如何治理自己，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君主教学法”，其中不仅有道德教育，还包括君主如何治理家业、治理自己的财产等，是君主“自我治理的艺术”。关键是向下的连续性，即在社会层面的治理，用魁奈的话就是“经济的治理”。这实际上就是指“家政”，是让国家的良好治理所遵循的同一原则传递到个人的行为和家庭的运转中去，要关照家庭内的人、物、财产等。这就是说，在国家和社会内部相互交织的治理形式中，依然贯穿着某种特定的能够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治理形式。不同领域的特征决定了治理形式的多样性，但是治理的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遵从治理对象的理性原则，因此，不同的治理形式之间是连续的而非矛盾或断裂的，治理是系统性的。

再次，“对事情的正确处理”。

在勒瓦耶列举的三种治理形式背后，各有一门特定学科作为支撑，自我治理背后是伦理学，家庭治理背后是经济学，国家治理背后是政治学。如果说“治理就是为了便利的目的而安排的对事情的正确处理”，那么这种“对事情的正确处理”依据的是各种具体的“知识”和“手法”，而非君主的统治权或主权及其法律形态。“如果说主权的目的在于主权，并且主权自身固有的手段就在主权的法律形态中的话，治理的终极目的则存在于它管理的事情中，存在于对治理所指导的过程的完善和强化中；治理的工具不再是法，而是一系列多种形式的手法。”这也就是说，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理念，它的目的并不是权力本身，而是通过运用权力的治理艺术来达到“对事情的正确处理”这个目的。

这当然不是权力的消解或弱化，而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权力关系，不仅与国家行政机构的全面发展、与各种政府机构的出现相联系，而且与各种“国家知识”的出现相联系。很明显，既然治理必须遵循国家的本质，那么了解和掌握国家的具体特质就成了治理国家的前提，因此，涉及领土、资源、人口、城市、安全等，一份处理方式的清单便罗列出来，“统计学”（statistics，意思就是关于国家的科学）似乎成了国家治理的基础知识，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人口学、卫生学、医学等，所有今天我们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知识，都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了一起，它们都是关于国家各种不同的因素、维度和权力要素的知识。难怪福柯会说“知识即权力”或者直接使用“权力/知识”的概念。

不过我们确实不能那么简单地来理解“知识即权力”，福柯在这里说的“知识”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浅层次的知识（connaissance），即我们通常理解的像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学家、精神病学家等提出来的理论思想；另一个是“深层”的知识（savoir），它不只是科学的知识，更像是一组假定的规则，是指一种“框架”，据此可以判定在某一领域中，哪些主张可以被视为“真理”而哪一些却必须是“谬误”，即通常人们认为的“真伪系统”并决定何为赞成或反对的理由，何为相关的论点和证据。所以，浅层的思想理论正是在深层知识的“框架”中才获得了意义。这种深层的知识，似乎就像对应于治理实践的“需求”，决定了各种思想理论的“供给”。

这让人想起康德所谓决定逻辑思维之或然疆界的、固定的、综合的“先验知识”。福柯也欣然接受了“先验的历史”这个说法。一段历史时期内的某个社会存在着一些基本条件，决定着哪些现象可以成为知识的对象，哪些知识通过哪些实践过程可以被视为“真理”。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竭力要从一些“不成熟的科学”中去发现这种“深层知识”，比如精神病学、临床医学等，因为在那些“成熟的科学”中，这种“深层知识”已经隐藏得

很深，不太容易再被发觉。

还是让我们回到福柯的《治理术》，看一看他对“重商主义”的分析可能就更明白了。他说重商主义是对作为治理实践的权力行使的第一次理性化，随着“重商主义”的出现，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作为治理手法的关于国家的“深层知识”的发展。但是，17世纪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危机，巨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紧张从头至尾折磨着17世纪，这种庞大明显的“历史理由”阻碍着治理艺术的发展。其次，是17世纪的其他阻碍因素，福柯称其为“制度结构和心态结构”，归结为“主权行使优先性”。他说“只要主权制度还是基本的政治制度，只要权力行使还被认为是主权的一种行使，治理艺术就不可能以一种特殊的、自主的方式发展。”然而，重商主义恰恰是由于把增强主权者的实力作为根本目标，使用的手段是法令、规章等传统的主权武器，从而使“治理艺术”受到了抑制和限制。一直到18世纪，随着人口扩展及其与日益充裕的货币的联系，以及与此关联的农业生产的扩张，治理艺术的发展才又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人口理论。

面对庞大、抽象而僵硬的主权，治理理论受到纤细、无力且脆弱的家庭经济的牵制，而人口理论则突破了家庭的限制，从而使经济主题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重新获得了中心地位。“正是由于对人口特有问题的认识，以及我们称为经济的那个现实领域被分离出来，治理的问题才最终得以在主权的法律框架之外被思考、反思和计划。而‘统计学’，在重商主义的传统中只是在君主行政的范围内并为了君主行政的利益而发挥作用的，现在则成为突破主权障碍的主要技术因素，或主要技术因素之一。”

四

福柯的例子告诉我们，所谓“先验的历史”就是强调思想理论是受历史条件，特别是治理实践嵌入其中的社会基本条件限制的，反过来也可以说，关于治理的理论思想是在治理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也是具体的、带有本土性的。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实践来说，有一个笔者曾经参与其中的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著名的浙江

温岭“民主恳谈”，最初只是作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新形式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随着国内外学者纷纷前往现场观察和深入研讨，“民主恳谈”逐步深入，渐渐地被定义为“一种新型基层民主形式”。2004年这一“形式”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之后，“民主恳谈”成了地方政府为洞察民意提高执政能力而采取的与民间对话的普遍形式，进而学术界又开始尝试从“协商性民主”来认识其价值和意义。2006年温岭新河镇首开先河，把“民主恳谈”推进到一直由政府掌控的公共财政预算领域。笔者参与了温岭泽国镇“2008年公共预算民主恳谈会”，直接的体会是其几乎重新建构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大推动了地方政府的民主治理，至此，“商议-合作型治理”模式才成为地方治理的一个典型。

理论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幽灵”，知识也不是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逐渐累积，它经常是处于“断裂”状态。理论思想是对变化中的各种现实关系的不断认知和思索，而知识则是不断变化的求知过程中某种相对稳定状态，只有当某些思想对应于现实的需求成为可能的时候，那些“深层的知识”才会为现实的实践提供所谓的“真理”依据。

改革开放40年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如何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切实地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之路。鉴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社会发育程度并不理想，如何能在现有条件下培育各种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社会治理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例如，在社区治理探索中，我们就碰到了“谁的社区，谁来治理？”的问题；在工会治理的问题上又遇到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工会”难以处理市场社会的劳资关系问题；在考察地方政府的治理实践时，又面临如何构建“社会多元复合主体”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改革和治理实践中逐步地深入探索，同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已经获得的经验和理论启示。

回到生活实践：中国社会转型的风险和机制

□仇立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在40年的中国改革中哪些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哪些领域的变化相对缓慢，哪些领域或许还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这个问题是每个研究中国的学者无法回避的。

“上海”：来自生活实践的体悟

笔者在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比如社会阶层结构等，深切感受到如果不能搞清楚社会转型，很多问题无法解释清楚。对此问题的思考，最初来自笔者的生活实践。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和知识背景往往是一个学者研究社会的起点或视角，或者说当一个学者的生活实践及其社会化与一定的知识背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构成了提出问题的基本逻辑。

笔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上世纪50年代出生，从记事开始经历了“文革”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深刻地体验到上海人是如何成为“上海人”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和东北都是共和国的“长子”，尤其是上海，在很长时期内上缴给中央的财政一直占据全国第一位，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上海相对于东北来说，转得更为“成功”，而东北却相反。从笔者的生活体验来看，上海的社会转型相对“成功”虽然离不开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以及上海的地域优势，但更重要的是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所经历的市场经济的洗礼和市场文化的熏陶，即使在1949年以后的革命与建设中，市场文化也一直潜移默化地主导着上海市民的行为。

2013年曾经和一位朋友在微信上讨论城市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的矛盾，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在中国的地方文化或者都市文化中，上海文化受到市场文化的影响最深刻，当然也包括殖民统治带来的西方文化。因此，北上广三个城市中，上海文化最具有或者最接近西方文化的底蕴，虽然再分配经济差不多要消解了它的生命力，好在历史没有更多地停留在这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又开始重新焕发出它的活力。

上海文化的特点就是它具有相对严格的科层制，办事讲规则、有章程，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很多外来“精英”都体会到，相对于其他地方，上海生存要比其他地方“简单”得多，如果在上海你感到还不能生存的话，或许是你的能力还不够。这也是很多外来精英，虽然会排斥、（有的）甚至怨恨上海，但又不舍得离开上海的原因。

因此，相对于其他地方，上海“原住民”率先完成了“市民化”或城市化的过程，即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现在多数上海“原住民”往往具有这些特征：乡土观念消解了，身上几乎很难看到任何乡土气息和对家乡的记忆；亲属关系简单化，除了直系亲属还保持一定的联系之外，其余的亲属关系按上海人的说法都是一种“客客气气”的关系，很少有直接沟通的联系，即使在一个城市也如此；金钱关系契约化，私人之间即使是兄弟姐妹、好朋友，除非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一般不会发生金钱关系；朋友之间只是一种纯粹的友谊关系，有时间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喝喝茶（咖啡）、吃吃饭，可以就共同的话题说上几句，彼此之间很放松，也可以很长时间不需要见面。

如果按社会学的解释，“市民化”或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首属群体简单化，次属群体疏离化，社会成员碎片化，个人成为“孤独者”游走在这个世界上；个人遇到问题主要依靠制度去解决，一个建立在分工协作基础上的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应该基本上满足人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虽然不可能全部解决。上海人的口头禅“啥宁要侬管”（谁要你管），其中背后的逻辑就是如“文革”中一些工人师傅所说的，只要“不赌、不抢、不偷、不搞腐化、不反党”，“‘生活’（沪语中指工作）‘攒’得出（做得好），谁都管不了我”。因此，在上海人那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法律、道德和政治的边界一清二楚。

学社会学的都知道，这就是现代性的结果，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个体与社会现代性的获得过程，而我们正在走向这条道路，只不过上海“小市民”因为历史机遇走在了前面。虽然“小市民”有很多毛病，比如眼光短浅，自私自利等，甚至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但在我看来，这要比依靠权力追逐利益高尚得多，比狂热的民粹主义好很多。

经历市场化或城市化后，完成了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才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公民，从农民→市民→公民，没有市场化过程是不可能的。因此，生活实践给笔者的启示就是，虽然上海还处在转型过程中，但是相对于全国来说，上海的社会转型还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上海市民化的程度在全国也是最高的，这都有赖于上海开埠以来 150 多年的市场化和城市化过程。

“风险社会”下的社会转型

如果说上海的社会转型经历了 150 多年的历史才初具雏形，那么对于全国来说，真正的社会转型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的，要在短短的 40 年时间里实现社会转型和“弯道超车”，具有很大的“风险”，即使如西方社会那样，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社会转型也充满了“风险”。

根据乌尔里希·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任何社会转型或制度改革都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并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这种风险有可能被放大。

如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在开始它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历程时就进入风险社会了（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文化）。它不仅表现为生态风险，而且还具有风险社会理论所推导出来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既是逻辑的，也是非逻辑的”风险性。也就是说，当代中国进入工业社会的路径选择本身就面临非预期性后果的风险。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转型的制度性变迁。1949 年以来大大小小的政治制度变革（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制度选择的“实验”，每一种“实验”都会产生社会风险，并且和进入工业社会发生的生态风险叠加在一起，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双重风险社会”，即制度选择风险和生态风险。

在风险社会理论中，一般认为风险社会内生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制度结构之中，即风险社会是与工业文明或现代性相伴随的，如果将此称之为“内生性风险”，那么，中国作为巨型国家的崛起，还面临着“外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主要来自两

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和信息化对中国作为巨型国家崛起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崛起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二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近代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战争、政治运动、各种社会思潮，不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严重影响到文化的传承。

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或历史逻辑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考察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逻辑或力量主要是强国家逻辑、平民主义逻辑和市场逻辑，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在本质上正是受到了强国家逻辑及其主导下的平民主义逻辑和市场或资本逻辑的重要影响，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格局。

1949 年后，强国家逻辑始终在社会转型中处于主导地位，反映了后发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动和重构。简单来说，国家既是一个具有高度认同的“想象共同体”，也具有强大的行动能力。

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表明，包括国家在内的共同体崩溃，才是近代中国自我中心主义或利己主义泛滥的重要因素：当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个人不能得到共同体的庇护时，沦为原子化的个人必然会采用最原始的方法维持自己的生存，社会也就可能变成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

放眼全球，即使像美国这样所谓的“民主的典范”，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中也经历了所谓“无治理”时期，即依靠政府权力的强制性或权威性重塑抗衡力量之间的平衡，政府直接承担“公共利益的实现者”和“社会公正的维护者”；德国和日本这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和宰制。

但是，如同亨廷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福山等指出的那样，如果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无法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得到满足，或者形成以榨干多数人的利益、为极少数人服务为目的“攫取性体制”，那么都会导致国家的失败。也就是说，强国家逻辑主导下的社会转型，如果具有潜在自主性的

国家行为仅仅服务于极少数利益集团而忽视平民与市场的利益，社会转型就将失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信息革命的推动，平民主义的权力扩张获得更多新的来源，形成了许多对抗资本和政治权力的社会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本和行政权力的扩张。但是，当平民主义诉求超出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组织的壮大和权力超越国家之上，不仅社会改革无法进行，而且也会出现所有的国家政策朝向有利于甚至是迎合社会大众的方向运行，出现米格代尔所言的“社会将侵蚀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及其呈现的市场或资本逻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强国家逻辑和平民主义逻辑，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条件。市场经济一方面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育并为其创造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要求建立一套与法律法规相衔接的市场规则才能正常运行。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或资本逻辑的渗透会逐步改变强国家逻辑的表现方式，即通过法律法规体现国家意志，进而规范市场与社会。同时，伴随着流动性和市场经济带来的现代性获得，将会逐步改变传统的平民主义逻辑。实践证明，大城市的法治化程度相对较高，市场化传统遗留的市民意识，以及伴随工业化过程的工厂制度的“规训”等，都将有利于形成理性的平民主义诉求和表达方式。

因此，在面向实践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加快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将千百万进城务工农民转变为市民，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慢慢获得“市民性”，将具有盲动性质的、追求极端平等的平民主义转变为具有理性倾向的平民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强国家逻辑主导下的社会转型中，市场或资本逻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它将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新的制度孕育在旧制度的萌芽中；或者如吉登斯所说的那样，系统存在的结构性因素将会否定系统本身。市场逻辑或许无法改变强国家逻辑的性质，但将有可能改变强国家逻辑的表达方式，也有可能改变平民主义逻辑的性质，逐步形成具有理性诉求的平民主义，从而形成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互动互强的权力格局，实现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

转型中的共同体意识

——基于华西村实践的观察

□周怡，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共同体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促发生机的重要性，社会转型期尤为如此。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明显存在两大转型：一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标志着计划再分配时代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型。二是2013年以来，由“中国梦”“新常态”启动的新时代，在政治经济层面上表现为“摸石头过河”向“顶层设计”稳健发展。前一转型在激发民间活力的同时，创造过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后一转型将在深化改革开放、全球化进程中更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而理论上，假如社会发展是一个无尽的由分化到整合、再分化到再整合的前行过程；那么伴随高速增长的前一转型隶属拉开档次的分化，转入常态化的后一转型则可被归纳在整合、治理的范畴。国家的发展是这样，一个村庄的发展亦基本囿于所在的国家发展框架。华西村就是这样一个始终保有“家（村）国同构”意识的共同体典范。

随着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当今社会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程度日益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意识，既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潜在体现出中国人“和为贵”的传统价值理念。华西村个案一直以来在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学界的发展模式分析、老百姓的心目中，都是坚守集体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新农村建设样板。显然，作为象征符号的“集体经济”“共同富裕”话语，与共同体意识有亲和性关联。一方面，几乎所有可行的行动都发生、成长于不断进行的关系历程中，关系构成共同体的基础；另一方面，共同体的概念要获得有意义的存在、理性和道德，应该发生在大家携手同行的共同行动中。以下我将围绕共同体意识及其行动，从家（村）国同构、村际合作及村内凝聚三个关系层面，重读华西村集体的改革实践。

保持两头一致的“家（村）国同构”

“保持两头一致”是华西村两代带头人新老书

记恪守的价值传统，即村庄发展始终要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与老百姓保持一致。在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华西人真正践行了这样的“两头一致”。其中，“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及其成功的改革实践，完美兑现了“对下一致”。这里我着重谈“对上一致”，即探讨村庄（华西村）与国家结为共同体的种种表现。从2002年开始去华西田野，每次我都有“家（村）国同构”深深的感触，一切在国家层面发生的内容（故事），在华西都有其一对应的微缩为村庄事实的表征或实践。（表1）

尽管村庄在中国属于最小的基层行政单位，它完全可以有较为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但华西村主动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紧随、并肩齐步甚或有超前。这一点应该是华西村能够保持“一路走红”成为改革标杆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在理论上，制度学派认为声誉既受制于社会认同，又受制于社会抑或国家的主流制度环境；在文化上，村庄“对上保持一致”的共同体意识，亦具体再现了中国人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国是家”的传统价值。

“一分五统”制度下的村际合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邻里通常会被纳入共同体关系的熟人圈范畴，“远亲不如近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与国家层面上推动的“一带一路”全球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相比，华西村早在2001年通过村民100%的签字同意，便实施了将周边村并入“大华西”共同发展的规划。统计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陆续已有20个（后合为13个）周边村加入大华西规模发展

圈。村庄面积从原先的“0.96平方公里扩大到约35平方公里，人口由1528人扩为35000人”^[1]。

规模扩大、村际集聚而产生的集群合作效应，以及统一规划发展的样貌都十分令人赞叹。至少，在视觉上我们看到的“大华西”共同体已经被山水分割成完美的三块区域：山北是农业区，山南依水乃工业区，中间镶嵌美妙的生活区。如果说1992年成立的华西企业集团曾象征华西彻底告别农业^[2]而多少让人质疑其“村”的内涵的话，今天“村”的涵义却在大华西的发展进程中做了一个华丽的回归，这个回归明显是村际合作的结果。今天我们去华西，可以在原来的澎嵩村也就是现在的华西九村，看到一望无际的金灿灿稻田，以及七位来自“华西中心村”的新型农民。“七人是在二三百人的竞争中得到这个（科技）农民岗位的”“完全智能化操作”“农忙时会聘请原村农民来打工帮忙”“稻米定位在城市中高端人群”（访谈资料）。也即，华西中心村的小伙子带着他们的高科技技能，来到山北这块原先较为贫瘠的土地种田；而原驻地（周边村）村民是提供劳动力的积极打工者；收获的稻米则惠泽城里人。中心村-周边村-城里人在这里浑然一体，组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日常食物链”上的共同体。

然而，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村际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并不容易。首先，需要有制度保障，这就是18年前村民一致通过的“一分五统”制度。华西村人早就率先全面进入小康，富裕起来的人并不愿意他人侵占资源或财富。之前，就形成“大华西”并村格局而言，本村人有过不少争论、反对和不理解。

表1 国家理念-村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的部分例举）

国家理念	村庄实践	一致性评价
“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责任制	“责任到户”（分田形式）	在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有自我发展的选择意志
邓小平南方谈话：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正式成立“江苏华西工业实业公司”后改名为“江苏华西企业集团”；1999年于深圳证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全国首家以村命名的企业上市公司	与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倡导一致，标志了以“集体控股、个人入股”新型股份制集体经济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1998年7月1日华西成立全国第一家村级党委，至今组织架构上是党组织拥有村庄最高的权力核心地位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整合
去产能，“供给侧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	2013年以来关掉10家高能耗企业，去产能约150万吨，守住生态底线；同时技改投入18亿元，成功创新企业并拓展了新兴市场	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与国家发展战略保持一致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构建合作共赢，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03年至今，周边经济较为薄弱的20个村，以“一分五统”方式陆续加入“大华西”同心发展	发展理念及其行动上先于亦类似于国家的“一带一路”
“精准扶贫”	近些年先后与20多个省市自治区开展帮扶合作，每年帮扶资金约1亿元	配合国家打出了“华西扶贫品牌”

当年的老书记坚持自己“唯善”的价值理念——“一村富不算富，全国都富才是富”，说动村庄人制定出“一分五统”的并村创新制度。所谓“一分”，就是村企分开。也即，“大华西”概念是村与村的合作关系，与各村的企业无关。“五统”，就是资金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以及村建统一规划。其次，需要村际间的理解、忠诚和包容。实施大华西战略的初心是“扶贫”，事实是并入大华西的13个村庄原本“都是贫困村”，且由于苏南人不愿种地，土地抛荒严重。并村的初心为“善”：帮扶，以达共同富裕。这种善心在大华西战略实施的初期周边村百姓曾经有过误解或矛盾，但华西人用时间、真诚及其实际的帮扶行动，让3.5万村民看到了形成规模后的集聚绩效。再次，需要有富足充裕并能真正兑现的经济实力。我访谈新书记时，他非常直率地说：“父亲当年要进行大华西规划时，我是反对的。是父亲的坚持，让我们不得不坚守。”他的坦言中裹挟满满的道路自信，这是成功者的坦率和自信，未来在这片乡村本土上将托起一个自主建构的新型城市，它将标志中国独有的城市化道路。

帮扶周边村所产生的集聚效应，说到底还是村庄人依赖地缘上的亲近、土地和人力资源的重新分配、村际合作关系而打造的一场地缘共同体行动：村与村携手共进的发展实践。

“选择回村”：华西第三代人的村内凝聚

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乡村的农业人口纷纷向城市流动，表面上趋同于西方城市化道路，实际上却呈现一个奇妙的过程，一种“候鸟式”生活方式悄悄展开，流动已经再也不是以定居为目的。其道理在于，乡土依然有村民无法割裂的东西，包括土地利益、情感以及熟悉的生活方式等。类似地，今天许多家长都希望看到孩子接受教育，但又担心孩子外出学习不再依恋自己家的生活方式。显然，在与土地联系更为紧密的乡村，这类担心更为普遍。

可是，华西村不存在上述情况。因为其一，华西的第一代人从不外出打工，唯有外村人为华西打工；其二，华西的孩子们，不管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念书，完成学业后都会选择回村工作。我2002年调查时，一位厂长夫妇的女儿在南

京著名高校读书，他们的女儿毕业后自己选择回到华西，工作和生活都相当圆满。相隔15年重回华西时，最令人欣慰的发现是：华西的第三代孩子们，99%学成后毅然回村。被问及“为啥回村”，他们的表情里会自然流露出对此提问的反诘，即“我们为啥不回村”。在他们那里，华西村有自己成熟的产业，“在由父辈搭建好的平台中完成自己的事业，远比自己创业要容易”，同时“家在这边，也有一种责任”。富足的生活环境，自由“放养”而不失前辈楷模力量的家教和村风，使这群年轻人相比其他同侪，既有坦率、单纯和务实的一面，也有对事业投注满腔热忱、勤奋工作、谦逊低调的宝贵特质。尽管华西一直是荣誉簇拥下的中国名村，面对粉丝经济的商业市场，他们深知自己的首要身份是“华西人”：爱护华西品牌就如同爱护自己的荣誉一般，这点思想共识体现在他们的村民大会发言、企业建言、“智慧论坛”中。华西第三代回村的事实充分说明，华西村内部的凝聚并没有随时间、代际的更替而消失；相反，村庄共同体意识早已被植入到华西所有人的骨髓，转变为他们伦理行动的道德罗盘。

在外出打工、地域流动成为常态的中国乡村，“不外出、外出读书后依然回村工作”的华西现象成了另类。我不相信一个集体抑或组织的热切投入是可以“制造”出来的，纵然其中可能有利益、规则和美好环境的诱惑。而日积月累的族群荣誉、族群共同体意识，却是能够在华西人身上寻到的实在。

总之，40年来华西村存在诸多令人瞩目的改革实践。其中，村与国、村与村、村内百姓三种不同关系层面发展或保持的共同体实践，是村庄转型及其发展始终处于良性运行的基本保证。正是共同体意识所催发的“携手同行”关系，以及在各类关系中由关系双方相互从事于意义、理性和价值的创造，才有了华西村集体经济持续蓬勃发展的实践形态。而“一路走红”的集体经济形态又会进一步强化村庄人的共同体意识，付诸于崭新的共同行动实践。任凭转型及其风险，共同体力量就像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世界一样，给这个村庄注入了非同寻常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2] 纪硕鸣. 信仰.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162.

于无声处：从社会生活资料中探索大历史

□张乐天，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18年9月下旬，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在图书馆办一个资料展，布展基本完成后，中心让我给展览取名，我琢磨着，脑海里跳出四个字“于无声处”。

社会生活资料及其特点

在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中国民间有许多资料，它们没有被纳入国家档案收藏的目录，却极其详细、非常鲜活地记录着人们工作与日常生活的故事。我把这些资料统称为社会生活资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资料正在大量流失。

社会生活资料是“无声者”的记录，是人民大众社会实践的描述，有极其重要的价值。2010年，我向复旦大学领导建议“抢救资料”：在全国各地搜集基层社会资料，建设一个观察、了解中国的资料平台，使中国的年轻人有机会看到他们的父辈们如何想、如何说、如何做，使国外的专家学者、友好人士有条件读到真实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从而可能更准确地了解中国。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复旦大学领导的认可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的支持。经过七年多的努力，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已经搜集了近五十万封个人书信，四千多种个人日记与工作笔记，一百多万份社会基层单位的文书资料与数据资料。从2017年下半年起，复旦大学图书馆直接参与社会生活资料的整理、编目、扫描以及数据库工作，第一期数据库工作已告一段落，今年年底将对大学生与研究人员开放。

社会生活资料区别于其他文字资料，尤其是书信资料的特点值得关注。

其一，细节丰富。在缺乏其他任何信息交流渠道的情况下，身处两地的恋人、夫妻、亲戚或者朋友以书信为唯一的沟通方式，这种“唯一性”促成了书信资料中充满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远方的丈夫为了让城里的妻子安心、放心，会在信里详细描述自己日常的工作与生活；更有丈夫在信中如此地关心妻子，以至于会叮嘱油盐酱醋之类的

“小事”。前线的战士会在信中把军旅生活描述得充满活力，而家中父亲的来信也总是反复叮嘱那些“小事”。岁月冲淡了人们的记忆，书信中留下的社会生活细节难能可贵！

其二，相对集中。解放以后，扫盲运动、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书信写作的大量增加，但每封信只有薄薄几页纸，极易流失。只有少数人会认真保留书信，而这些被保留的书信流入到社会上，并最终被我们搜集，更充满着偶然性。正是这一系列“偶然性”使得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搜集的书信具有“相对集中”的特征，这就是说，书信不是分散、杂乱的，而是相对集中在收信人手中。我们统计了已经扫描的53581封书信，共涉及收信人516人，人均收信84封，其中收信最多的是一对上海夫妻，两人从小青梅竹马，1971年男的下放到安徽农村插队，女的到上海大厦做服务员，从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通信。两人共收信789封，全部信件文字超过80万字。

其三，情感、道德与价值观的表达。在很多情况下，书信是恋人、夫妻、亲子、亲戚、朋友之间交流情感的最重要方式，这成就了书信资料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极其丰富的人际情感记录！我们从其他任何资料中都很难看到这种文字。此外，书信资料中还有较多的道德表达与价值观陈述。

当然，书信资料的“不足”也是明显的，例如，资料的碎片性，难以验证性。书信是两个熟人间的互动，他们有着许多共享的知识，读者可能读不懂基于“共享知识”上的文字。

书信与研究方法

社会生活资料都是人们日常工作与生活的记录，丰富却十分琐碎，生动却无法验证，如何有助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准确理解大历史？我们需要进行研究方法的思考。

（一）“多样性回归”

读书信，给人最大的冲击在于：原来中国人那么多，中国社会那样复杂！这就是说，读者可能从书信中看到此前从未想象过的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智慧圆滑的中国人，看到此前难以置信的许多社会行为与社会现象。这些知识对于理解当代中国

宏观历史有意义吗？回答是肯定的。格尔茨曾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谈到怀特海的自然科学研究准则：“寻找简单并怀疑之”。多少年来，意识形态把当代中国历史极大地“简单”化了，却一直没有对此提出质疑，从而可能把曲解历史的“简单”当作历史的“真理”。社会生活资料正是怀特海笔下的对于“简单”的怀疑，进而实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实践真实存在的“多样性回归”。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特别是理解毛泽东时代的大历史而言，这种“多样性回归”有助于研究人员从真实的社会实践出发重新理解中国社会与中国道路！

我们的“重新理解”可以借助于两种重要方法。一是个案与拓展的个案。由于书信资料本身具有“集中性”，特别对于那些集中程度比较高的书信组，我们可以把这些书信组看成是当年写信人在长期通信过程中记录下来的个人与家庭生活史资料。二是从特殊-普遍角度看，每一组信件作为一个特殊收信人的收藏，都潜藏着普遍性。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从来都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以群的方式存在；而此群区别于他群，就是因为每一个群都有一些普遍的、共性的东西。进一步反思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从属于不同的群，每一个群都有“所属的道理”。因此，我们可以把每一组信件都看成“作为群存在的个案”。我们认真阅读分析某组书信，就可以对收信人或者写信人所属的某个“群”有更好的理解。当然，为了更好地把握某一类人群的普遍性，我们可以选取几组甚至几十组同一类人群的书信。例如，我们想研究知识青年，可以选取几组不同知识青年的书信，通过阅读与比较发现有关知识青年的“普遍道理”。

（二）“自然选择性抽样”

我们可以把随机留下的信件资料看成“自然选择性样本”。从20世纪中期到2000年，由于民众文化程度的提高、政治运动、户口政策等因素，中国人的通信频率大大提高，信件数量极大地增加了。信件不易保存，绝大多数信件都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只有极小一部分个人信件被我们搜集起来，收藏于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或许，每一组信件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但是，那些迷人的情节早已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无影无踪；最终留下的只有一封封信件。

这些信件都不是研究人员根据某种规则选择的，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自然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成是“自然选择”，并因此提出“自然选择性样本”的概念。假如同一个类别的书信达到一定数量，我们就可以进行类似定量研究的工作。目前，资料中心已经搜集了近五十万封书信，我们有机会根据“抽样”原理展开研究。

大历史探微

我曾经觉得自己对中国已经比较了解，随着资料搜集工作的展开，却惊讶地“从旧纸堆里发现了新世界”！这是我从“文献田野”里发现的大历史，从无声者的言说、底层人的书写中体察到的中国道路。

1978年，我从浙江海宁农村走进复旦大学。浙江农村的生活是清贫的，但决然没有到“崩溃的边缘”；大多数人包括本人，很难想象人民公社消亡。30多年后做研究，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盘旋：中国改革的政治、社会、历史前提在哪里？仔细研读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书信，有两类特殊的信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一类信称为“申诉”信，亲友之间讨论申诉的策略，朋友之间证明申诉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向有关部门要求“平反”。这类信都指向某一场运动，都强调运动中“搞错了”，因而至少要求“恢复名誉”或者要求“恢复职级”。有趣的是，我还看到了大量各级领导在“申诉”信上的批示，说明他们的申诉得到了正式处理。另一类信称为“揭发”信，这类信通常都是写给各级组织部门的，说某某人现在担任某一类党政职务，该人在某次运动中是积极分子，犯有什么样的事，应该把这个人“拉下马”。我在大量调查中发现，革命运动中靠着“造反”上台的人，1980年前后确实大多“下台”了。两类信情况不同，却都是指向历次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最终，随着绝大多数人被“解放”，阶级斗争也实际上被彻底否定了。那时候，报纸上时而还出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文字，会议中也常有这类声音，我们从无声的书信中体察到了历史的潮流。民众以悄然无声的行动创造着改革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前提。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松绑”，那么“松绑”

以后，无数中国人如何想，追求什么，又怎么做？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走向。人的追求与想象支配着人的行为，而无数人的行为总会赋予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以烙印，总会约束着社会演化的路径。1980年代数万封家信引起我的关注，特别是“松绑”的关键一年，1984年的书信给我启迪。信中所呈现的中国人的心态与行为方式隐含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

1980年代中期，书信中已经很少能读到革命的豪言壮语，人们渐渐把目光聚焦到了自己身上，重新定位个体、家庭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国家“松绑”后，亿万人的“中国梦”凝聚成一股巨大力量，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前行。

其一，知识。读1984年的书信，当年人们追求知识的精神让人动容！江西一群农村青年，生活困难，却相互鼓励着、支持着刻苦学习，有的浑身“有一股用不完的钻劲”。上海建平中学的女孩考进清华大学外语系，感觉如同进了“天堂”似的。南京的一位父亲，每次收到部队儿子的来信，总会一字一句帮助其改正文字、语法的错误。上海一位技术干部春节期间到广州进修，除了到一位老师家吃年夜饭，其余的时间都在读书，他信中说：“这一年的春节是我有生以来感到是最充实的一年。”许多人已“拖儿带老”，仍“挤”时间学习业务知识，想着“把虚度的时光夺回来”：上海照相机厂有几个去日本进修的名额，有的人说要“拼命复习，争取被选上”。江苏省兴化农村的几个高中生，两次高考失败后仍努力追求知识，有人在信中写到“前途是光明的，但需要百倍的信心和顽强的毅力……考不上我也不气馁。以后，我只有到知识中寻找乐趣。我想：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催化剂。知识也是前进的火把。同时，我也只有从知识中索取营养。”诸如此类文字，动人的故事，书信中随处可见；追求知识成了那个时期的潮流！

其二，自我追求。1950年代，中国建构了“国家优先”社会秩序，在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中，个人被放在最低的位置。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松了对个人的约束和对企业的管制，个人的积极性被迅速调动起来。读书信可以明显地感受到，1984年无数人心中的所欲所求。曾经，无数人响应

国家号召离开城市，离别亲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在，无数人不顾集体甚至国家的需要，只求实现夫妻团圆、亲人团聚。上海一位医生写信给离别30年的姐姐的信说：“我们是骨肉同胞，是水总要汇集在一起，是情总要缠绵在一起，只恨是相会何晚。在此，我深情地叫您一声：姐姐。”亲情是自我之梦，发财则是一部分人的强烈追求。从几位乡镇企业厂长的书信中，一位浙江省黄岩农村“顶替”到上海的职工的书信中，一位环境保护局基建处处长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了大量讨论“生意经”的文字。令人惊讶的是，一位上海的基督徒也积极参与生意，在信中感谢耶稣基督的保佑、赐福其坚忍不拔地追求财富的勇气与力量，并把追求财富比作“马群凌空之梦”：“古有‘天马行空’之谚，愿上主吉成！惟主首是瞻，阿门！”

其三，关系。自我发展的强烈意愿会转化成强大的行动力量，如何行动？特别在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怎么办？书信给出了答案：以最大的可能充分利用关系。1984年前后，许多书信涉及夫妻分居、恋人相隔、知青回城等，为了调动，人们激活关系，找关系，拉关系。一位来自黄岩农村的上海顶替职工，1984年前后收到来自家乡的几百封信，有的信出自朋友的朋友之手，信写得挺客气，其实都“有所求”。令人惊讶的是当年“拉关系”路径的错综复杂，“攀关系”手段的灵活多样，以及关系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程度：连购一张火车票甚至买一块豆腐都要“找关系”！

2018年10月，秋高气爽，我坐在窗前读着改革开放初期的书信，于无声处，感悟着那萌生于改革初期却一直影响着改革进程的潜流。无数人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的努力慢慢积淀成伟大的生产力，助力于经济发展与转型。发财的欲望与亲情的聚合激发出中国人的智慧、“敢为人先”的勇气与百折不挠的韧性。关系把这一切编织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演绎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不断地被经济社会发展所改变。

关系的改变与人的改变是一块铜板的两面，共同构成理解当下中国的关键话题，也一定会左右中国未来的走向。于无声处，社会生活资料提供了更全面、准确理解当代中国大历史的契机。

ABSTRACT

New Life Philosophy: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of Open Ethics

Han Danyuan & Sun Zhouxing & Zhao Tingyang & He Huaihong & Wang Guoyu & Duan Weiwe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notechnology, genetic enginee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emerging technologies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s and discussions. Emerging technology offers the possibility of a happy life for mankind, but it also brings mankind to an uncontrollable future. It is not only the sword of Damocles hanging over our head, but also the Pandora Box in front of us.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related to the integrity of human subject, human dignity and human status in the natural world, which leads to deep thinking and debate on bioethics and law, life value and the fate of mankin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pos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challenges and propositions to mankind, and we must respond to them. For example, how to re-advocate a new philosophy of life and keep the final boundary of natural human beings? Whether and how to make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new technology and its consequences, and make a comprehensive plan for the future shape of human life and civilization? How to construct a preventive ethics and law to control the risk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source? How to find the boundaries of certainty in uncertain times and then construct an ethic of uncertainty. And some other questions. For these problems, it is urgent to seek consensus through continuous discussion and even contention. To this end,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invited well-known humanities scholars and important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to discuss and provide their own possible solutions. It is published here for the readers.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expert arguments in this album only represent personal opinions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position of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Scholars are welcom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further participate in and promote discussion.

Academic Response in the Age of Great Change

——**Sociologists and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Zhou Xiaohong & Zhao Dingxin & Zhai Xuewei & Xu Yongxiang & Wen Jun & Feng Gang & Chou Liping & Zhou Yi & Zhang Letia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societ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 many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China is currently a strong country with a well-off population, and its education level and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Every year, more than 100 million Chinese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ck of creativit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ublic health and population problems, the deficiencies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and the value crisis have brought challenges to China's further development. Faced with this era of great change, Chinese social scientists, as supporters, participants and observe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es on various problems emerged ou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y have put forward a lot of valuable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nd have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abilit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suc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ociology Forum" was established. Nine sociologists discussed the theme of "academic response in the era of great change", demonstrating the charm of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strength of Chinese sociology.

New Development of History Discipline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Ma Keyao & Jiang Yihua & Qian Chengdan & Su Zhiliang

Abstract: On October 13th to 14th, 2018, the "Annual Working Conference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 Committee (Seminar on New Areas, New Problems, New Methods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y Discipline)" was held in Zhejiang University. More than 40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discussions.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have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new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new field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made a summary and reflection. From the conference, we know that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China is organically combin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with that of world history. China's historiography has also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exploring new fields such 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urban histo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y, public